

100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党对外交往的三大特点：人民性、独立性、时代性

王健：从百年对外交往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嘉宾主讲

今天很高兴来和大家交流中共百年对外交往史。我们党在一百年的奋斗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同时正确处理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的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也是顺应时代大潮的产物。”“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也是基于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下决心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一往无前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

我党对外交往基本脉络

这一百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至今。

建党到新中国成立

从建党之初到新中国建立，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我们党在对外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1922年二大后成为共产国际支部，瑞金苏维埃埃政权提出对外主张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列宁的倡导下，于1919年3月建立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俗称第三国际）。列宁将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世界革命的范畴，制定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东方战略，中共诞生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了一定的促进和帮助作用。所以，中共一大除了13位国内代表之外，还有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

到了中共二大，中共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从国共合作转为独立自主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的对外交往机构。

1936年斯诺访问延安，毛泽东表达和英美结成统一战线愿望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东北，1933年德国希特勒上台，共产国际号召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为中共所采纳。为了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共中共领导下抗日的认知，1936年7月，经宋庆龄推荐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访延安，历时四月顺利考察后，第二年《红星照耀中国》先后在英国、美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并轰动了西方世界。1937年8月，该书经过地下党联系在上海翻译出版，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毛泽东接见斯诺时特别强调：“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表达了愿意和英美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愿望。

斯诺访问延安揭开了中共对外交流的序幕，有人将此称为“斯诺模式”，是国际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情形下的一种有效的“他塑”方式，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1944年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团来访，揭开“半独立”外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缅印战区成立，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参谋长。在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中共利用一切机会和渠道，积极开展与盟国、特别是美国的交往。到1944年冲破国民党阻挠取得了两个突破。

第一，6月成功邀请了20多位中外记者组成西北参观团。其中有六位外



5月22日，第154期文汇报·中共党史系列第四讲《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中共百年对外交往》举办，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应邀作主题演讲，并进行媒体对话和听友互动。

整理 李念 金梦 本版摄影 周文强

国记者，除了苏联塔斯社记者普罗岑柯外，其余都是如《纽约时报》《时代》杂志、《泰晤士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毛泽东在向美国记者斯坦因阐述中共的外交方针时主张中国与美苏都应该保持友好的关系。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访问延安，美国还提供了部分军事物资。

第二，7月至8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至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才完全离开。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委派而来，希望能够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这支抗日力量，并与合作，增强东方战场的力量。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上，毛泽东发表了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标题里称其为“战友”，足见用心和重视。这打开了世界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扇门。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是我党“半独立”外交工作的开始。所谓“半独立”是指当时中共开展的外交活动还需要国民党政府的允许。

我党第一份外交工作文件、第一个对外机构、第一批外事人才

通过接待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诞生了我党第一份外交工作文件、第一个对外联络机构，积累了第一批外事人才。

1944年的8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是我党第一份关于外交的正式文件，进一步强调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它明确提出：“我们的外交工作已经开始。”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军委外事处，负责对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和接待任务。这是我党最早建立的专职对外联络机构。1947年5月1日，周总理未雨绸缪，果断地以这些富有外事经验的干部为主体，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组，主任叶剑英，与其他部门并称中央八大机构。其下编译处主要编撰国外欧美报纸信息，并将毛泽东和中央文件翻译并传播出去，为新中国外交储备了人才。

1945年12月，军委外事组接待了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负责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的马歇尔将军。

1949年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毛泽东提出“一边倒”政策

抗战胜利后，我党曾希望国共合作，和平建国。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特别是美国最后完全支持蒋介石政权，使得战后和平建国的时机被错过。在内战爆发之前，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美国 and 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倒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一认识标志着我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也指明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

1949年新中国即将建立之前，苏联派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在接见米高扬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提到了国际关系问题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即所谓脏屋子问题，清扫干净再请客。6月30日，为纪念中共建党28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非常明确地指出“一边倒”理论，并进一步明确：“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高度重视外交工作，外交部长长期由总理周恩来兼任。作为执政党，中共将其外交思想作为全面推动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外交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捍卫民族独立，冲破西方的封锁；二是在“一边倒”的同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三是在世界上坚持公平正义，支持发展中国家

抗美援朝赢得国际地位，万隆会议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苏联援助我国改建新建了156项重点工程，大大推进了我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从国际主义和中国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决定出兵。他指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这场战争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了日内瓦会议。1954年中国尚未返回联合国，却第一次作为世界大国登上了国际舞台。第二，与西方大国关系有所发展，中国政府同意派遣代办驻英，双方保持“半建交”关系。会后，与美国开始了领事级谈判，次年升格为大使级，这个谈判一直持续到1970年2月，累计136次，达成了一项协议——1955年中美签订的“双方平民回国协定”，依据该协定，钱学森等120多名留美学生返回祖国。第三，1953年底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得到了亚非国家的充分肯定。万隆会议后，我们与亚非国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两个中间地带”被提出，1972年中美关系突破

1950年代后半期至1960年代，中国的整个外交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第一，1965年3月以后，苏联开始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双方进入敌对状态。第二，1964年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不断扩大战争规模。为此，毛泽东提出了美苏争霸之间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亚非拉国家与美国之外的资

本主义国家。1974年，毛泽东又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期间，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关系取得进展，但同时于1964年与法国建交，实现与西方大国建交的历史性突破。中日关系也“以民促官”，不断推进。“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是中共国际统一战线的成功运用。

珍宝岛冲突后，1969年5月，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老帅受邀提交了《对战争形势初步估计》，分析了两对主要矛盾：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毛泽东决定改善中美关系。此后，整个外交局面就打开了。中国也重返联合国，到1976年底，我们已与110个国家建交。后来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改革开放后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的对外交往，一是邓小平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真正的“不结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二是冷战后，我们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化、建设和谐世界；三是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同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1970年代末，整个世界的周边环境从独立转向了谋求发展。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主题的重要战略判断。1985年3月4日，他会见日本外宾时用“东南西北”四个字概括了世界大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2013年3月，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首站出访俄罗斯，创造性地提出了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新型国际关系包含了政治上结伴不结盟、经济上包容发展、安全上合作共享、文化上交流互鉴四方面内涵。这是对传统国家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对五大路径的行动方略进行了全面充实和升级，提出“五个世界”论述，形成了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架构、大方向、大主张，且规范了终极性的目标，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体系或思想。

在“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习近平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情义为重的正确义利观等等。

我党对外交往三大特点

回顾我党百年对外交往发展史，有三个显著特点：人民性、独立性、时代性。

坚持人民性

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宗旨与价值追求

一方面，外交的人民性体现在一切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从世界范围而言，就是为了争取人类的解放和幸福而维护世界进步事业。对外来说，我们承担了自己的责

任。仅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已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救助，向8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向50多个国家出口了疫苗。对国内来说，现在非常关注外交为民，特别是海外领事保护和海外中国侨民的安全。2011年利比亚撤侨，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能够脱身于战乱是极为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另一方面，人民性还体现在外交依靠人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首先提出了人民外交的崭新理念。人民外交、民间外交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外交。中美关系得到突破，就起于50年前的小球推动了大球”。

坚持独立性

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基石和灵魂

新中国成立以后，“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干净再请客”这两条政策坚定捍卫了新中国的外交独立，即使在“一边倒”中，周恩来也强调“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1957年，毛泽东在出席莫斯科大会讨论《宣言》稿时提出要加上一条，“各国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

改革开放后我们坚持“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一切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独立判断。邓小平说：“我们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坚持独立性，还体现在尊重他国的独立。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上，习近平主旨讲话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坚持时代性

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活力和生命力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抓住机遇。抗战爆发后我们抓住机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巩固了新中国，通过同盟关系解决了安全和经济援助问题；1970年代初，根据美苏关系的变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大大改善了中国战略环境；改革开放后，准确判断了“和平与发展”主题，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本世纪初，我们抓住“911”后美国大幅调整对外政策的契机，通过加入WTO，利用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迅速发展自己。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根据形势变化，对外交工作作出了顶层设计，指明了前进方向，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仍处在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如何认识并把握新的机遇，这就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过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四位优秀提问者与王健、张维汉（右一）等颁奖人合影



▲且听且记



▲凝神聆听



►记录历史